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 号

总 记 登 号

B01.54/tcDe32

150310

下 集

吕骥文选

人民音乐出版社

吕骥文选

下 集

人民音乐出版社

呂驥文選
下集

*

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號)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205千文字 3插页 9印张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40册

ISBN 7-103-00098-0/J·99 定价：2.80元



1963年2月，周总理参加文联
扩大会后与音协同志谈话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7800·55
总登记号	150310

目 录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85.1.54/tcd0e32
总登记号	150310

铭记亲切的教导，继续战斗向前.....	
简论“五四”时期的新音乐运动.....	(9)
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几种陶埙	
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	(15)
从马可的两首歌曲想起的.....	(31)
恢复后，做什么？.....	(37)
谈当前声乐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45)
轻音乐与百花齐放.....	(55)
《晓河歌曲选》序.....	(58)
继承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为实现四化作出新的贡献...	(66)
用“百家争鸣”促“百花齐放”.....	(75)
音乐的社会作用.....	(86)
悼念我们的田汉同志.....	(88)
《李群儿童歌曲选》序.....	(92)
回忆左翼剧联音乐小组.....	(97)
论安波同志的歌曲创作.....	(104)
读《王莘同志歌曲选集》有感.....	(110)
《黄准歌曲选》序.....	(115)
悼元庆同志.....	(120)
新的成新，新的问题.....	(123)
站在我们走过的道路上展望未来.....	(130)

谈谈社会主义音乐问题	(143)
《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间歌曲乐曲选集》前言	(167)
《陆春龄笛子曲集》序	(170)
“我是为社会而生的”	(172)
办好音乐期刊，更好地为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183)
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	(193)
高、深、远、广、严、勇、	(196)
关于在音乐战线开创新局面的几点意见	(201)
三十八年的悬念	(206)
抵制精神污染是人民的愿望	(208)
从“一切向钱看”谈起	(211)
部队歌曲所反映的生活是多么广阔	(218)
《李伟歌曲选》序	(225)
悼念卓越的音乐史学家杨荫浏先生	(229)
中国音乐学、乐学和有关的几个问题	(236)
光荣的工作	(254)
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	(258)
促进我国律学科学的更高发展	(269)
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74)

铭记亲切教导 继续战斗向前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两周年，全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怀念周总理。我们革命音乐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得到周总理的亲切指导发展起来的。周总理离开我们以后，大家都决心在党中央领导下，继续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思念周总理的心情化作揭批“四人帮”的战斗力量，彻底肃清“四人帮”在音乐文化中的影响和流毒，使音乐艺术百花盛开、蒸蒸日上。我自一九三七年在山西太原第一次听到敬爱的周总理的振奋人心的关于抗战形势的长篇报告以后，到现在已经四十一年了。在这四十一年中，我受到周总理的不能以数计的亲切教导，现在就其中几次和所听到的有关指示略加整理，以志怀念之情。

(一)

敬爱的周总理对于党的音乐事业的关怀是一贯的，也是多方面的。但总起来看，都贯穿了一条红线：坚持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这一点非常鲜明。

远在一九四六年夏秋间，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成立时，周总理就迅速地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中央管弦乐团工作方针的指示：不要尽搞古人的、洋人的，要搞我们自己的。这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是鼓励我们要创作出反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管弦乐作品，要善于用管弦乐这种形式来为工农兵服务。

大家知道，一九四六年夏秋，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准备大举进攻我各解放区的前夕，叶副主席那时正在北平的军调处三人小组工作，代表党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同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叶副主席同样关怀我们党的音乐事业，从北平买了一大批管弦乐队需用的乐器送回延安，党中央马上决定建立中央管弦乐团。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虽然处在保卫解放区、保卫我国革命胜利成果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于我们党的音乐事业的发展考虑得多么周到。

全国解放以后，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国务活动中，仍然非常关怀我们的音乐事业。记得一九四九年九月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刚结束，在一次会议中见到周总理，总理亲切地教导我，要我多考虑与政策有关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春，周总理陪外宾去天津，虽然日程非常紧张，但还是抽出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到中央音乐学院和教师们见面、座谈。周总理询问了教学、生活方面的情况，特别问到洋土嗓子争论解决了么？教师们提出了希望学校搬到北京去，周总理在座谈结束时风趣地、也很严肃地说，什么时候你们把洋土嗓子解决了就什么时候搬到北京去吧。周总理当时特别嘱咐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方针正确解决洋土嗓子的争论，特别希望我们在学院工作的同志要注意研究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民间音乐，演唱艺术要特别注意发展民族风格。

周总理长期关怀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如何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经常注意我们的各种演出，同作者、表演人员谈创作上、表演上的问题，敏锐地观察到我们音乐艺术上存在一个重要的方针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甚至于看出我们这些做领导工作的人还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就是音乐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和群众化问题。

的确，由于我们音乐舞蹈工作者对于工农兵所喜爱的民间音乐和民族风格都不很熟悉，又缺乏调查研究。有些人还带有不正确的观点，认为中国民间的音乐舞蹈不科学、落后，资本主义国家的音乐舞蹈科学、进步，因此，完全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虽然全国解放已经多年，这些观点并没有彻底清理。每次政治运动一来，有这种思想的人赶快把这种思想收藏起来，运动一过去，这种思想又搬了出来。所谓民族化、群众化问题，说到底还是我们的思想革命化问题。因为不解决思想上的革命化，就不可能解决音乐舞蹈创作表演上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反过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周总理对于音乐舞蹈存在的问题观察是深刻的，所提出的问题是符合实际的，的确是音乐舞蹈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

周总理对于音乐舞蹈工作所提出的问题和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所讲的我们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致的。可是到了六十年代，我们音乐舞蹈工作者对此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当然也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周总理再一次向我们提出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六三年周总理亲自召开并主持了首都音乐舞蹈工作者座谈会，当时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也都参加了。周总理最后讲了话，并且作了具体指示，要求文化部和音协、舞协进一步研究，认真加以解决。一九六四年冬，周总理在去非洲进行国事访问之前，还抽出时间关心我们即将召开的全国音乐舞蹈工作座谈会，后来因为日程太紧，才没有再接见会议的主持人。会议结束后，周总理要求我们在报刊上继续对音乐舞蹈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继续了一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才结束。经过这次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于纠正音乐舞蹈工作者思想上忽视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错误倾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大家认识

了问题的严重性，进一步理解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就不可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二)

周总理除了从路线方针上关怀音乐舞蹈艺术的发展之外，同时也非常注意平常的演出活动，并且总是通过对各种演出的具体指导帮助我们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周总理一贯认为歌剧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应当写革命历史，应当反映当前的人民革命斗争，应当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应当反映革命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周总理一看到这样的歌剧就加以肯定，大力鼓励。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鲁艺创作了歌剧《白毛女》，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毛主席、周总理看了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是好戏。对于《白毛女》还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认为对民忿极大的恶霸地主必须镇压，对黄世仁、穆仁智应该分别处理，否则不符合党的政策、不利于发动群众。

全国解放以后，对于新创作的歌剧，周总理也非常关心，并总是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去看。周总理认为好的作品，看一遍不够就看两遍，有的甚至看了三遍以上。看后不仅亲自接见演员、导演、编剧和作曲人员，还有一些不适当的情节、唱词、表演动作提出意见和大家讨论，有时还特别申明，这只是个人的意见，也许不对，不要急于修改，先这样，考虑成熟了再修改。我有机会参加了这样的座谈，觉得很幸福，听周总理的讲话，实际是上了一堂艺术理论课，也是得到一次民主作风的教育。周总理还有一种令人感动、给人教育很深的习惯，就是对成功的歌剧中的优美唱段，一定要学会唱。有的唱段，我们搞音乐的都还不能全唱出来，周总理已经能背唱了。

周总理看了《洪湖赤卫队》以后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反映革

命斗争最成功、最动人的歌剧。《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周总理平常最爱唱的几个片断之一。周总理认为它把革命激情和革命抒情统一起来了，这是许多人所没有做到的，一般人容易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其实那是不对的。周总理对于这个唱段的极高评价，是对我们上了一堂音乐美学课。《洪湖水，浪打浪》具体体现了革命的音乐美，它是革命的音乐美的化身。周总理还高度评价了另外一部革命歌剧《向阳川》，这部歌剧是在甘肃流行的民间歌曲“花儿”的基础上创作的，是一部共产主义风格的颂歌。周总理在北京先后看了两次演出，也学会了其中的一个唱段，和甘肃省歌剧团同志们举行座谈，希望他们到全国各地演出这部歌剧。周总理认为这是他所看过的解放后的两部最好的歌剧之一。

有一年周总理到南方去，看到扬剧《夺印》，认为非常好，马上打电话回来要歌剧院派人去看，并且要他们改编为歌剧。后来歌剧团演的《夺印》就是由扬剧改编创作的。

周总理认为歌剧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最有力的武器，因此不仅要认真选择题材，根据现实生活结构动人的情节，深刻地写出人物的阶级性格，而且也应该充分考虑剧场演出效果。全国解放后，我们的歌剧团都获得良好的演出条件，几乎都有一个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每个剧场舞台前面都有一个宽阔的乐池。由于我们工作中考虑群众不够，乐队强大的声音在演员与观众间造成一堵不可超越的音墙，观众听不清演员所唱的内容。周总理对于这堵音墙有很大意见。一九六二年前后，有一次周总理在天桥剧场观看《白毛女》连排，从前排到后排，从楼下到楼上，无论在剧场的哪个位置上都听不清演员的唱词，乐队声音却很强，最后周总理生气地离开了剧场。后来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和你们斗了十几年，你们还不改，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几年!?”周总理这种处处从群众出发考虑问题、处处为群众着想的态度和

作风，给了我们异常深刻的教育，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三)

周总理从来就非常关心群众歌咏活动，认为通过群众歌咏活动可以团结青年、可以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在延安时期，我曾多次见到周总理在晚会中、会议休息时，同大家一同高唱革命歌曲。有时总理从外面(指国统区)回来看到我们时，一定要亲切地询问最近有什么好歌。一九四〇年以后，由于我们鲁艺搞关门提高，群众歌曲写得少了，写出来的歌曲和当时群众火热斗争结合得不紧，或者缺乏高昂的革命热情，因此延安的歌咏活动不象以前那么蓬勃了。有一次总理看到我，带着批评口气问道：“怎么搞的，歌咏活动不象过去那样好了？还是要写些好歌，把歌咏活动搞起来。”

全国解放后，前七八年歌咏活动开展得还比较好，到三年困难时期，歌咏活动几乎全停了。有的地方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是生产第一，现在既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眼前连生产都顾不过来哪有力量来抓群众文化生活！虽然广大群众有唱歌的要求，做具体工作的干部也有很高的积极性，由于基层某些领导同志不重视也就无法活动了。当时我们也错误地认为生活上有些紧张，领导又不重视，就不要去争取了，等生活搞好了再搞吧。可是总理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生活是有些困难，但精神不能垮下去；生产是要抓的，业余唱歌并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能提高精神、促进生产，部队不是打仗也要唱歌么？他还托人带口信给我说：“如果你们再不抓，我要派部队来搞歌咏了。”由此可见，周总理是多么重视群众歌咏活动的精神作用，而我们自己又是何等缺乏认真干革命的精神！周总理的话实际是对我的严厉的批评，同时也是对我进行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

大家也一定会记得周总理参加一九六〇年纪念聂耳逝世二十五周年、冼星海逝世十五周年的音乐会，最后站起来指挥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的感人场面。可以说这就是总理为开展群众歌咏活动的给大家所作的最生动的动员令。同时，周总理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总是作为群众中的一员，从来不高人一头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出现。这种亲切的态度和平等待人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 * *

我们国家的音乐艺术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由于敬爱的周总理坚持贯彻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半个世纪以来，由小到大，由较低的水平达到较高的水平，速度越来越快，成绩越来越大。但是，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邦”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炮制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所有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文艺干部和老一辈文艺家通通打成民主派、走资派、黑线人物，有人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把所有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通通打成宣扬封资修的黑货而禁锢起来，把整个文艺队伍打得七零八落，把一片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变成了一片荒原。直到党中央粉碎“四人邦”以后，在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指引下，已经实现了一年初见成效。继去年八月党的十一大之后，今年又召开了空前团结的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全体人大代表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要在二十世纪之内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会又听了叶副主席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经过修改的宪法。明确地提出了文艺工作新的战斗任务，宪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文学艺术和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使全体文艺工作者受到莫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

大旗帜，在文艺岗位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作出新的贡献，使随着我国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别出异采。

1978年3月

简论“五四”时期的新音乐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起点。毛泽东同志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这个评价是合乎实际的。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就成立了。五十八年来，我们的全部革命事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成的。我们胜利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地克服了国内外的险滩恶浪；今天又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的长征。我们的音乐事业和其他的事业一样，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不断前进，在各个时期做了我们必须做的工作。不论在音乐创作上，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以及其他各方面都积累了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

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大革命运动。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同时也高举着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但反帝特别是反霸还是今天的重要任务；反对封建思想影响还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坚持社会主义民主还要求我们进行大量工作；科学的普及和科学水平的提高还是我们当前工作中一个重大课题。我们要继续前进，就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社会主义音乐事业完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在党还没有直接领导这个事业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音乐事业基本上是沿着五四运动的方向，缓慢曲折地发展着。“五四”以后，我们看到了第一批由我们自己的作曲家所写的歌曲作品和介绍西欧音乐的论著。肖友梅、赵元任、刘天华、王光祈、丰子恺……以及其他一些音乐家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在不同的领域，对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个时期所产生的作品，特别是赵元任先生的一些富有独创性的作品，如《劳动歌》，就是站在工人方面，用乐观的音调，歌唱了要求生活、要求教育、要求休息与劳动的先进思想。《卖布谣》的词更是形象地刻画了民族手工业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迫下而破产的悲惨情景，曲调十分朴素而带有几分感伤，使唱者和听众都感受到作者在创作时的激动情绪。《教我如何不想他》是一首杰出的抒情歌曲，歌词巧妙地借一个少女初恋的情怀，通过几个景色的描写，不绝如缕地倾泻出来。曲调更是低回婉转地把歌词的深情完美地表达出来。这样的抒情歌曲，在冷酷的封建势力还严严地统治着几乎整个中国的年代，可算得一颗猛烈的炮弹，震醒了青年们不敢表露的爱情，也粉碎了封建思想堡垒。《海韵》更是以隐喻的手法控诉罪恶的旧社会象疯狂的海浪一样吞噬了一个追求自由的天真少女的一部合唱。这是一首悲剧式的哀歌，也是对旧社会一切恶势力的诅咒。赵元任先生创作的歌曲数量不多，许多篇都有特定的生活内容，都有不同的意境，也可以说都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总起来看，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音乐上真实地反映了“五四”以后那个时代一部分对现实生活已有所认识，却又还没有决心走上斗争道路的知识份子的精神世界。凭着他对语言（特别是语调）有精微的感觉，在歌曲中用他独创的音

乐语言塑造了一个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的知识份子的典型形象。

刘天华先生则是在民族器乐领域作出了贡献。他的音乐显然是建立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却又有新的创造，用二胡（经过他的改革）抒写了“五四”以后这个时期相当多的彷徨苦闷而对前途又还抱有光明希望的知识份子的情怀。他的《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是突出的代表作品。他把二胡的表演艺术提到了新的水平，并且创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教学方法，编写了一套教材，为发展二胡艺术奠定了科学基础，为继承与发展民族音乐传统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这里我还必须提到黎锦晖先生。从他前期有进步意义的作品来看，由于他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不深，影响了他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对于现实生活的分析也有很多唯心主义成分。他虽然对于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怀着同情心，然而，对于不幸的社会根源却缺乏正确的分析，把它归于生活中的偶然遭遇。虽然他没有认识五四运动的巨大社会意义，但是在五四运动的民主精神影响下，使他对于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寄予深切的关心。《麻雀和小孩》、《可怜的秋香》、《葡萄仙子》、《月明之夜》、《小小画家》大约都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写的。可惜他后来由于生活思想的变化，抵挡不住资产阶级生活的侵袭和诱惑，终于醉心于资产阶级黄色歌舞音乐的写作，因而中断了他过去刚刚开始的有进步意义的事业，同时也毁掉了他的前程。即使这样，也不能使我们忘记他前期对少年儿童音乐创作的有益贡献。由于他对于少年儿童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动相当熟悉，加上他的民间音乐素养，使他能够写出既富有民间色彩，而又朴素自然的儿童音乐语言，所以他的这些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飞向全国千万所城乡的中小学校，受到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他